

被误读的 中国经济

Growing like China

张军 / 著

像中国那样增长

这个喧嚣的时代，一些被多次重复、振振有词、貌似权威的说法，其是一堆谬误；真知灼见，只存在于冷静的、理性的、基于历史和理的严谨推理之中。张军的许多论著，属于后者。

——樊纲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被误读的 中国经济

Growing like China

张军 / 著

像中国那样增长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 张军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060-6493-4

I. ①被…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7796 号

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BEI WUDU DE ZHONGGUO JINGJI)

作 者: 张 军

责任编辑: 姬 利 李 烨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9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493-4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第一部分 揭开经济增长的谜团 / 1

中国的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

——张军与诺顿对话 / 3

中国经济为什么减速？ / 19

中国经济究竟是失衡还是失公？ / 28

我为什么不认同中国经济失衡说？ / 35

中国经验：发展、转型与国家能力 / 41

谁制造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繁荣？ / 44

关于中国经济规模追上美国的时间表 / 50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再增长 20 年？ / 54

为什么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 / 62

揭开中国消费过低的谜团 / 69

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与发展 / 74

高昂的成本正在控制着中国经济 / 86

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 / 89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 93

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未来要下降，回归大国正常值 / 95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 / 98

闹猛的中印竞赛 / 105

中国入世给经济学家的教训 / 108

大江东去浪淘尽：写在入世五周年 / 111

迷失在亚洲增长 / 115

产业升级为何这么难？ / 119

全球化时代究竟什么是“中心”？ / 127

怎么才算国家富强？ / 130

全球危机把中国快速推向资本输出方 / 133

入世十年回头看：经济学家的预言都错了 / 136

其实，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解放日报》与张军教授对话 / 139

第三部分 经济的真相——书评中看经济 / 147

谁主沉浮？（上）

——读《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 / 149

谁主沉浮？（下）

——读《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 / 161

张五常巧解中国的经济制度 / 177

朱镕基是对的 / 185

为什么提高收入流动性更重要？

——读《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 / 191

苏联悖论——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 196

萨翁并不真正相信自由市场制度 / 202

经济学是这样成为经验科学的

——《两个幸运的人》中一个片段的阅读遐想 / 209

书架上的经济学 / 215

第四部分 生活中的经济学 / 231

腐败能改善效率吗？ / 233

为什么不涨价？ / 239

为什么我说是农民工支撑了中国宏观的繁荣？ / 241

农民工工资赶超大学生不是坏事 / 244

高房价是被识别出来的 / 247

房产税试点是勉为其难 / 250

涨价的追问与追忆 / 253

如何征税是大有学问的 / 260

世界不被颠倒的逻辑 / 262

第一部分 揭开经济增长的谜团

中国的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张军与诺顿对话

2012年9月17日下午在复旦大学“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上，美国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与我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是否终结的话题进行了对话。对话用英语进行，《东方早报》记者根据现场的发言录音进行了翻译整理和补充采访，形成了这个文字稿。经对话的主办方审订，2012年10月16日该对话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全文发表。

张军：中国的增长阶段转型将会更平稳

巴里·诺顿教授用一个颇有意义的概念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可能性作出了预测，即中国经济将从超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适度增长阶段。诺顿教授特别强调，这两种增长阶段之间缺乏平稳转换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减速的关键。

他作出这一推测是考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减速的经验教训。日本在经历了1955年~1973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增速的陡降，从1973年之前的9.3%下降到了之后4%左右，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是的，当时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的日元升值只不过是日本经济增长“跳水”的一个导火索，核心问题出在从超高速增长模式向适度增长模式的转型轨道上。日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脱了轨。

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和中国台湾似乎也没有例外。在诺顿教授看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教训有理由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如何实现从超高

速增长阶段到适度增长阶段的转型产生疑问。

结构性问题总体上被夸大

的确，日本在 1973 年前后出现的增长跳水实在令人不解。不过，我对诺顿教授给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看上去，它们的减速更加温和与渐进。即使在 1973 年~1990 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仍然能保持超过 7.5% 的增长率。1990 年~2010 年，日本经济增长仅有 0.63%，而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和韩国都以超过 4% 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了。

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亚洲四小龙”的人均 GDP 水平接近日本的时间就是在 1995 年~2010 年间。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保持长达 25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减速现象，是基本符合“收敛”原理的。但日本不同，即使在 1973 年，按购买力平价估计，它的人均 GDP 也只有美国的大约 60%，它的增长动力突然熄火实属罕见。这种情况与中国 1957 年~1962 年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业产出陡降有些类似。可以推测，事情会是因全要素生产率（TFP）由高速增长突然转变成负增长引起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在中国，大多数人希望未来中国经济能拥有基于国内消费和多样化的内部需求的新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基于出口和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希望是对的，因为支撑超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有朝一日都是会改变的。

诺顿教授并没有提到，多高的增长率是适度的，但适度增长模式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它更多依赖可持续的需求条件，它的增长基于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国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诺顿教授提醒，中国可能朝这个适度增长阶段发展，但问题是，当这些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的变化到来得过快时，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从第一阶段到大多数人期

望的下一阶段的平稳转型，是不一定的。现在，与很多人一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 8%）深表怀疑，甚至多有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经济的崩溃也在所难免。

这些悲观的看法看上去的确与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相吻合。但是，我一再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总体上是被夸大的了。

诺顿教授在谈到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时提到的贸易顺差数据是 2007 年。这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接近于 GDP 的 10%，这是典型的异常值。事实是，过去 10 年来，尽管中国的出口强劲，但贸易顺差占 GDP 的比重尚仅有 3% 左右，谈不上什么严重的结构失衡。

国内家庭消费的增长尽管慢于 GDP 的增长，但过去 10 年，两者的增长率差距却是一直在缩小的，到今天也只有差不多 1 个百分点的差距。另外，考虑到未来 40% 的农村人口将涌入城市，未来 20 年的城镇化过程释放的投资需求依然巨大。

至于多数人对中国投资效率的批评言论，我认为也需要谨慎些。我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朱天教授最近的一个计算多少让我们有了些信心。中国过去 20 年间平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 4.06，比 1981 年 ~ 1990 年 3.86 平均 ICOR 只是略有上升。要知道，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 一般都会上升。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还发现，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 ICOR 分别是 6.32 和 12.62，岂不是上升得更多？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化总体上却并不大，绝对水平值更低。这一结果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过去 20 年中国何以保持年均 10.5% 的增长率。因此，我认为，谨慎对待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必要的，但过于悲观是没有道理的。

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

在过去的 20 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10.5%）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经济超高速增长，正如诺顿教授提到的那样，我们今天发现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条件和需求条件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显著放慢，工资在持续上升；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用地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摩擦也在加剧。

我们很容易发现，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这些条件变化改变的其实是成本。所以我们不妨说一个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至于需求条件，似乎还找不到改变的证据。

事实上，未来维持高增长的需求条件并不是在恶化。这是因为，当前出口增速的急剧下滑只是暂时的，贸易摩擦加剧反映出中国出口的潜力和竞争优势依然巨大；随着工资收入的上涨和城市化的加快，国内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只会加速而不会减速；进一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释放的投资需求还将维持起码 15~20 年。

既然这样，中国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增长模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也就是诺顿教授所说的，如何从原来的增长模式平稳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上来。很显然，新的增长模式如何能够适应新的成本条件，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新的成本条件是否能成功诱导出的新的增长模式，当然就是一个关键。

在两个增长模式的衔接问题上，我认为中国比日本有优势。日本之所以出现模式衔接上的问题，造成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跳水，日本的规模太小自然是主因。第一，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第二，由于经济规模小，成本条件的改变来得就比较猛烈，对经济增长的打击自然就比较大。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日元的首次大幅度升值均造成日本的出口遭遇滑铁卢，日本国内市场狭小使得企业无法很好找到

应对这些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地。再比如，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刘易斯拐点出现于上世纪 60 年代中，这个时期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半途。由于没有缓冲的余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终结和工资上升的影响不仅来得快，而且影响特别大；工业用地成本的上涨也来得凶猛，对投资造成重创。

这些条件的变化迫使日本的企业不得不逃离日本以求生存，后来就演变成日本经济的“空洞化”现象。另外，日本国内的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也造成国内经济转型的困难。这是日本经济在面临成本条件改变时不能很好应对的主要原因。

增长动力可转移到内陆省份

我想提醒诺顿教授，为什么中国不能将增长动力从东部地区转移到内陆省份呢？那些地区拥有相对足够的劳动力，是能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上，鉴于中国规模巨大，地区或省份之间差异之大超过了大多数的经济体，所以成本条件的改变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温和得多。

作为一种模式过渡的渠道，中国是有机会将经济引擎逐渐转移到内陆省份的，这是因为即使中国沿海地区面临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中国在未来十年甚至十五年里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低技能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之所以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流向东部地区，是因为东部的那些制造业企业不再能够承受工资上涨的压力，它们自己是需要转移出东部地区的。

这些年，如果你在中国的内陆省份待过，你会发现中国的内陆省份的支付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并努力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投资和工厂转移。不难理解，由此大多数内陆省份的 GDP 增长率这些年都超过了 10%，而东部地区的增长有所回落。

所以，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自己拥有“雁阵机制”来缓冲新的成本条件的压力。这样的话，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

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中国可能通过将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来保持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确，中国的内地发展可能是增长模式平稳转型的天然渠道。

结构多样化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

从未来 15 ~ 20 年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不低，低速增长（5% 或以下）的可能性极小。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有大约 1 万美元，不到美国的 10%，仅为韩国的 25%。即使未来 10 年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陆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陆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来看，投资需求依然旺盛。这是因为，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见图 1-1）。以过去 30 年平均每年 1% 的速度来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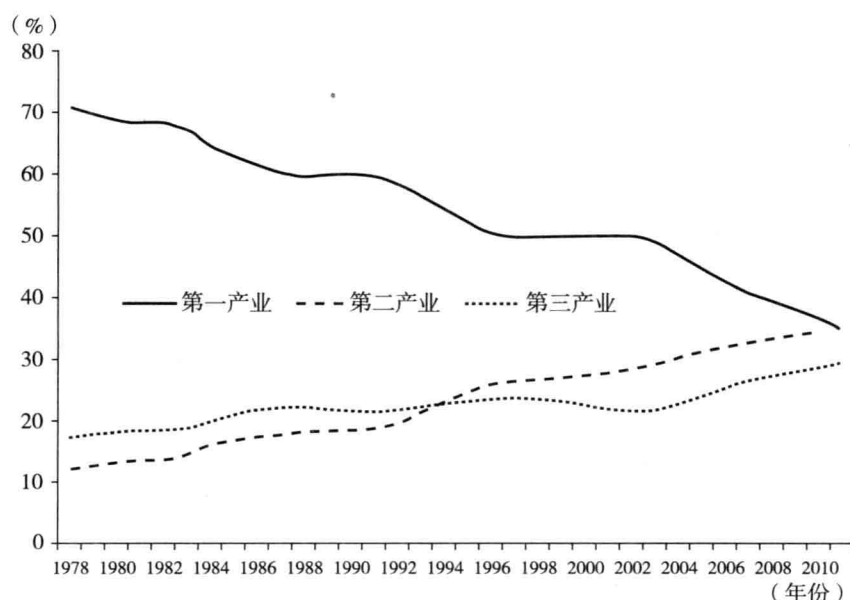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就业的部门比重

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 20 年才能使其就业在部门间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达到 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 20 个百分点，这还需要 20 年。

实现增长模式转型需要鼓励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中国经济需要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这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结构的升级不可能瞬间发生。好的信号是，我们已经观察到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开始在地区之间发生快速流动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业已向内地迁入。服务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之前我已说明，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成功地使经济结构多样化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结构转型将在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继续发挥作用，不仅支撑平稳过渡，也将对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作出贡献。考虑到正在变化的条件，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我相信全要素生产率将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的成本条件的出现是经济调整和结构变化的催化剂。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依赖于产业在地区间的成功转换。正如现在的局面那样，结果 20 年的增长之后，增长引擎正在转移到投资需求日渐增长和劳动力丰富的内陆省份，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

在一些像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正在发生。过去 20 年来在一些产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培育的创业型企业正在快速成长，并得到高素质人力资源储备的支持，这是很有希望的。它们将成为东部地区未来的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贸易正在取代制造业成为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经济流量。

与此同时，在产业升级换代和向新的增长阶段过渡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成功保持了过去 20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看上

去是在增加，甚至对外资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很大的改变。今天更多的人开始把外商直接投资看成是与我们争夺资源、市场和利润的对手，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们过去在很多产业发展上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向外资开放的产业，无论技术进步还是结构升级，都表现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我们对广东省和浙江省的研究也显示，在30年前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极其相似的两个省，30年来两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演变轨迹却出现很大不同。广东的表现好于浙江，而外资的参与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解释。

中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保持体制的灵活性以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在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具有足够的弹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今天，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新的成本条件，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新一届政府需要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诺顿教授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政府在这点上做得好坏直接决定未来增长模式的转换能否平稳。

耶鲁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教授在十多年前重新评价东亚模式时说过，过去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市场还是在于政府争论不休。其实，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作出变化。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重要。这句话对当下中国不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吗？

巴里·诺顿：中国，调整以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

在美国作演讲时，每当谈及中国经济减速，我总是向听众强调，应

当区分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差别，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本质是不同的。当下中国经济的短期减速是由于受到国内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及欧洲经济下滑的拖累。而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更感兴趣。其实，当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短期下滑的同时，也会留意到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阶段正走向终结。

中国“超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终结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在 2007 年的经济体量是 1978 年的 12.5 倍。这一“超高速增长”（Hyper-Growth）是由这几个因素驱动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成功改革；促进快速结构改变的大量投资；成功加入世贸组织；2008 年之前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体。所谓“超高速增长”，是指经济不仅高速增长，而且保持持续性的高速增长，一般持续 20 年甚至 25 年。

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的确，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和历史上其他经历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相比，速度更快，持续的时间更长，但是根本上，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走向终结的模式会与其他经济体类似。

这些经历过“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政府、外资、私人企业都投入很高），汇率维持低水平且对出口商有优惠政策。

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每个经济体也都有组织商业活动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说，每个经济体的策略都力图适应自己的制度。与此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外国商业和外国投资。

比如，在日本，企业集团（keiretsu）、经营多种业务的联合大企业、综合商社（sogo shosha，贸易公司）起主要作用，大公司数量较少，使得政府容易进行协调。而在中国台湾，由于存在有效竞争市场、灵活的